

元代农事诗中的社日与祈雨民俗

龚文慧

淮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安徽 淮北

收稿日期：2026年6月15日；录用日期：2026年7月22日；发布日期：2026年7月29日

摘要

诗歌作为重要的文化载体，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社会历史背景。农事诗以“农”为核心，不仅是农业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更是农事民俗的生动写照。元代农事诗中继承了前代农事诗的创作传统，真实记录了元代的社日民俗和祈雨民俗。从农事诗中的民俗书写能够看出，社日和祈雨作为中国古代农业社会由来已久的民风民俗，在元代得到了传承。元代农民一年会举办春社秋社两次社日活动，向社神祈求耕作顺利。而为了应对旱情，民间诞生了驱逐旱魃祈雨、祈龙鞭龙祈雨等多种祈雨法，是元代农民对旱灾的积极应对。

关键词

农事诗，社日民俗，祈雨民俗

Sheri and Rain-Praying Folk Customs in Yuan Dynasty Agricultural Poems

Wenhui Gong

School of Liberal Arts, Huaibei Normal University, Huaibei Anhui

Received: June 15, 2026; accepted: July 22, 2026; published: July 29, 2026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cultural carrier, poetry reflects the social and historical context to a certain extent. Centered on agriculture, agricultural poems are not only a vital form of agricultural culture but also a vivid portrayal of agricultural folk customs. The agricultural poems of the Yuan Dynasty inherited the creative tradition of previous dynasties and faithfully recorded the Sheri custom and rain-praying custom of the Yuan period. From the folk descriptions in these poems, it can be seen that Sheri and rain-praying, as long-standing folk customs in ancient Chinese agricultural society, were preserved and passed down in the Yuan Dynasty. Yuan peasants held two Sheri ceremonies annually—

the Spring She and Autumn She—to pray to the God of Soil for smooth farming. To combat drought, various rain-praying methods emerged among the people, such as expelling the drought demon and invoking or whipping the dragon for rain, representing the active response of Yuan peasants to drought disasters.

Keywords

Agricultural Poems, Sheri Folk Custom, Rain-Praying Folk Custom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自《诗经·豳风·七月》开启农事诗创作先河，以农村生活为核心内容的农事诗就成为中国古代诗歌创作的重要题材之一。农事诗不仅是诗人对田园风光、农耕劳作的文学描摹，更承载着特定的农业文化基因，是“以诗证史”的重要文献载体。元代的诗歌创作并未衰落，仅《全元诗》中便收录有近 5200 位诗人的 14 万首传世诗篇，其中以农事为题材的诗作达 1400 余首[1]。民俗作为特定社会群体固定化、类型化的生活现象，是社会风尚的承载者，也是民族文化认同的重要标志。而农业民俗与农业生产息息相关，作为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反映着底层农民的生产方式与精神世界。在元代农事诗中，社日与祈雨民俗是出现频率较高、书写较为细致的两类农业民俗，二者均起源于中原农耕文明，在元代历经传承与发展，深深植根于元代农村社会，成为元代农民应对自然、祈求丰收的重要方式。

社日民俗起源于原始的土地崇拜，是祭祀土地神的节日。自先秦发端，经秦汉发展，至唐宋趋于鼎盛，在元代未曾中断，仍是元代农村社会的重要民俗活动。祈雨民俗则根植于古代自然崇拜，是生产力水平低下的背景下，农民因生产生活受制于自然环境、依赖自然天象，而形成的祈求上天降雨、缓解旱情的祭祀仪式，是中国古代农业社会的普遍民俗。社日和祈雨民俗在元代农事诗中都有着丰富而具体的书写。

2. 元代农事诗中社日民俗的书写与内涵

社日民俗历史悠久，起源可追溯至原始社会的土地崇拜。万物生于土地，人们的生存依赖土地。在古代社会，人们无法解释土地孕育万物的自然现象，便将土地神化，认为土地有灵，形成了原始的土地崇拜信仰。《孝经纬》载：“社，地之主也，土地阔不可尽敬，故封土为社。”[2]社神作为掌管土地的神灵，成为古代农民祭祀的核心对象之一，社日便是祭祀神灵，祈祷农事顺利的节日。

社日的起源与在古代文献中有着明确记载。社日是最古老的祭祀节日之一。陈来曾指出：“社是土地神，周代的社神信仰至为普遍，作为农业民族的华夏族最早产生的可能就是地神。”[3]《礼记·郊特牲》载：“社祭土而主阴气也，君南乡于北墉下，答阴之义也。日用甲，用日之始也。”[4]这些记载表明，早期的社日祭祀有明确的仪式规范，祭祀日期择取甲日，即每月的第一天，象征着开端与新生。社日有春社秋社，在一年的耕作开始之时祈求今年的风调雨顺，秋季五谷丰收时感恩社神恩德。农事在中国古代作为头等大事，庇佑土地的社神在古代有着极为尊贵的地位。“国中之神，莫贵于社。”([5], p. 424)《礼记·郊特牲》载：“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载万物，天垂象，取财于地，所以尊天而亲地也，故教民美报焉，家主中霤？而国主社，示本也。”([5], p. 686)由此可见，社日在中国古代最初是一种十分重要的祭祀活动，逐渐由祭祀仪式变成了一种普遍的庆祝活动。历经发展之后确定成了中国农业社会的特有民俗。

历经唐宋的发展,社日民俗日趋成熟,不仅祭祀仪式更加规范,更融入了民间歌舞、宴饮、集会等娱乐元素,成为集祭祀、祈福、社交、娱乐于一体的农村节日,深受底层农民的喜爱。元代农事诗中对社日民俗的书写,便是社日民俗在元代持续发展的佐证,诗中以生动的笔触记录了元代社日的祭祀仪式和民间活动,还原了元代社日民俗的真实面貌。

元代农事诗中的社日民俗书写,涵盖春社与秋社,既记录了社日祭祀的核心仪式,也描绘了社日期间的民间活动,更抒发了农民在社日中的情感诉求,呈现出丰富多样的书写形态。

春季作为一年劳作的开始,农民举办春社以求风调雨顺农事丰收。春社日作为重要的节日,农民都会认真准备祭祀所用之物。杨公远在《次金东园农家杂咏八首》其一中写到,“买酒割鸡祠社后”[6]。这句表明了农民在春社日祭祀时做的准备。农民在春天举办社日祭祀土地神,以求农事顺利。农民在社日准备肉酒,买酒杀鸡,体现了农民对社日的重视和对土谷神的虔诚与敬畏。再如胡奎的《穰田》:坎坎鼓,祀田祖。新酒在孟豚在簠,阿翁呼孙儿馈妇。拜跪祈神降田所,愿神再三听祝语。五日一风十日雨,穰穰满家多黍稌。往来野田无雀鼠,出入道路无豺虎。丁男在家应门户,先祈一半输官府。神今有食农有土,常年力作甘辛苦,春秋报神神莫负([7],p.145)。这首诗描写了社日祭祀的场景。农民敲着社鼓进行祭祀,摆上新酒和猪肉,一家人都来参加。农民希望社神能够听到自己的愿望。保佑一年风调雨顺,能获得好的收成。没有鸟雀田鼠破坏庄稼,出入没有豺狼虎豹。社神享受祭品,农民能够有田可种,常年辛苦也情愿。春秋两次祭祀,希望社神不辜负农民的期望。

农民在春社祈祷一年风调雨顺。一年劳作之后,农民在秋社庆祝获得丰收。如方夔的《社日思家》:晓鼓咚咚露未收,老翁鸡瓮祝瓿篓。家家酒绿粉榆社,处处霜红柿栗秋。笑别比邻包祭肉,醉呼童稚认归牛。一年两度村田乐,不羡人间万户侯[8]。第一句中“露未收”写出举行社日的时间很早,甚至露水还没有干,社鼓已经敲响。老者带着祭品参与社日。这表明社日祭祀的重要性,以及元代以家畜为核心祭品的社日民俗传统。后面两句则用“酒绿”“霜红”的颜色描写烘托了社日平淡却吉庆的节日氛围。举办社日时的秋景没有肃杀萧瑟之感,反而酒绿霜红,一派喜庆。家家准备好社酒,“柿栗秋”则点明这次举行的是秋社。柿子、栗子都是当时普通的秋日采摘的农作物。接着便写社日结束时的场景,大家带着祭肉,笑着和邻居告别。社日开始,众人带着祭肉参与祭祀,结束后带着祭肉回家,盛大的活动让众人都喝醉了。最后则用不羡万户侯来直抒胸臆,社日平淡的村田之乐要胜于“万户侯”。底层农民盼望平淡安宁的生活,不去羡慕位高权重的富贵人家。虽然描写的是农村的社日,但诗人却在这首诗中表达了自己对农村生活的向往。

元代农事诗中的社日民俗书写,记录了元代社日举行的仪式与活动,也反映出传统农耕文明在元代的传承与发展。元代社日民俗承载着原始的土地信仰,土地崇拜作为中国古代农耕文明的核心信仰之一,贯穿于中国古代农业社会。这种古老信仰没有在元代中断,从元代农事诗中不难看出,社日民俗十分普遍。社日祭祀活动,是农民顺应自然、敬畏自然的具体体现。农民努力耕种,也希望获得丰收。元代社日活动相较于前代,原始自然崇拜淡化,社群意识得到明显增强。社日慢慢变成农村的集体庆祝节日。这表明,原始自然崇拜虽然减弱,但农民们逐渐意识到了土地生产的脆弱性,集体意识得到增强。社日活动将村里人聚到一起,共同祭祀、宴饮、娱乐,这为各人之间交流联系提供了平台,也凝聚了农村社群的向心力。社日民俗是元代农村社群意识的反映,这种社群意识,正是中国古代农村社会的重要纽带。元代社日民俗在祭祀对象、祭祀日期、仪式流程等方面,均传承了前代的传统,如祭祀土地神、春社与秋社的时间设定、箫鼓齐鸣的祭祀仪式等,这些都与前代的社日民俗一脉相承。

3. 元代农事诗中的祈雨民俗书写

除了社日民俗,祈雨民俗同样是中国农耕文明中历史悠久的传统民俗。在元代并未中断,得以延续,

并成为元代农村社会的重要民俗。元代水灾旱灾频发,根据《中国救荒史》中元代的相关记载,元代曾经发生过八十六次旱灾[9]。农事诗中有着丰富的祈雨民俗书写。这些诗作以纪实的笔触记录了元代祈雨的仪式过程,还原了元代祈雨民俗的真实图景。不仅反映了元代面对灾难的态度,还具有丰富的民俗学意义。

祈雨民俗作为中国古代农业社会历史悠久的民俗现象,根植于原始的自然崇拜,和祭祀鬼神等民俗往往有着密切联系。在古代农业社会,田地生产所必需的雨水常常不稳定。古代社会的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无法对自然天象进行科学解释,只能被动应对旱涝灾害。当遭遇旱灾时,农民便将降雨的希望寄托于上天,认为上天有灵,掌管着风雨雷电,通过祭祀可求得降雨来缓解旱情。祈雨民俗虽然由来已久,但不同时期往往有着不同的祈雨仪式。元代的祈雨仪式蕴藉着丰富的民俗学意义,反映着元代独特的风俗文化。根据《全元诗》记载:元代民间广泛出现诸如巫术祈雨、雷击旱魃祈雨、神树祈雨、蜥蜴祈雨、祈龙鞭龙祈雨等多种祈雨法[10]。旱魃、神龙相关祈雨是农事诗中出现较多的祈雨民俗。

旱魃出现于中国古代神话,旱魃带来旱灾,所到之处颗粒不收。在最早的神话传说中,旱魃是止水止风雨的天女。《山海经·大荒北经》:“有人衣青衣,名曰黄帝女魃。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应龙蓄水,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杀蚩尤。”([11], p. 415)此时的“魃”还没有和“旱”绑定,人们对“魃”的看法也没有偏向灾害。《山海经》中,“魃”是一位穿着青衣的天女。在与蚩尤的战斗中,黄帝被风雨所困。于是黄帝请魃这位天女来止雨。雨停后,黄帝战胜了蚩尤。此处黄帝女魃的形象是一位天女。《诗经·大雅》中提到旱魃为虐,如惓如焚。此时的“旱魃”和黄帝女魃已经有了不同,“魃”和旱联系到了一起。在农业生产严重依赖自然雨水的中国古代社会,“旱”自然不为人所喜。慢慢地,“魃”的形象就发生了变化。《艺文类聚》对旱魃的描写则已经和《山海经》有了很大不同。书中记载:“南方有人,长二三尺,袒身,而目在顶上,走行如风,名曰魃。所见之国大旱,赤地千里,一名谿。遇者得之,投溷中乃死,旱灾消也。”[12]此处“旱魃”这一形象已经彻底和旱灾联系到了一起,对旱魃的描写是“身材短小,裸露身体,眼睛长在头顶,行走如风”。旱魃到的地方就会发生大旱,土地寸草不生。把旱魃扔到浑浊的水里,就能杀死旱魃,结束旱灾。

元代农事诗中的祈雨民俗就包括驱逐旱魃来祈求降雨。张翥所作的《题胡汉卿参政祈雨诗》:“大地风雷驱旱魃,重渊云雾起神龙。涸泉已发瓶罍溢,焦土还滋草木浓”[13]诗歌只有四句,却生动再现了驱逐旱魃的祈雨民俗。诗中所描绘的旱魃既去、神龙现身、泉流复涌、草木重荣的画面,正是时人对祈雨成功后大地重新润泽的典型想象。杨维桢所作的《送邓炼师祈雨歌》:“东海水,枯沃焦,神工无处寻天瓢。松陵太守闵民苦,疾呼邓师诛魃妖”[14]诗歌记录了地方官府在旱情严重、束手无策之际,请道士设坛作法、诛杀魃妖以解民生困苦的真实情境。“东海水,枯沃焦”,以夸张之语渲染旱情严重。东海都已经干涸,田野尽成焦土,表明了旱灾范围之广、危害之深。连天上神工都无处可寻舀水之天瓢,进一步表明旱情严重。“疾呼邓师”,则将视角从旱灾转向祈雨,“诛魃妖”三字直接点明祈雨的核心关键,旱魃是带来旱灾的妖邪,只有诛杀旱魃,才能结束旱灾,拯救百姓。再如胡奎所作《祷雨歌赠杨炼师》中:“今年魃也肆恶如火烧,平原万口嗷嗷不自活”([7], p. 288)就提到魃妖肆虐导致大旱,万千生灵性命都受到威胁。再如《秋后三日得雨》中:“岂但农心悦,频消旱魃灾。”([7], p. 162)可见,诛杀旱魃祈雨是元代十分普遍的祈雨方式了。

除了击杀旱魃祈雨的习俗,元代同样继承了龙神祈雨习俗。龙作为“百鳞之长”,能够行云布雨。《山海经·大荒东经》云:“应龙处南极,杀蚩尤与夸父,不得复上。故下数旱,旱而为应龙之状,乃得大雨。”([11], p. 370)应龙居于南极,因为应龙杀了蚩尤与夸父,应龙不能上天庭,导致下界遭到干旱。民众于是模仿应龙之状以求大雨,足见龙神信仰与祈雨活动的结合由来已久。到了唐代,龙王更是成为民间信仰中正式的司雨之神。《唐会要》卷四十七载:“封东海为广德王。”[15]龙神变为龙王,四海龙

王的地位得到正式确立。到了元代，在民间信仰中，龙王依旧是司雨之神。在元代农事诗中就存在相关祭祀祈雨的民俗描写。如胡奎的《迎龙曲》：“朝迎龙，暮迎龙，旱火烧天龙在宫。县官投牒石潭中，山南山北鼓逢逢。蜿蜒跃入杨枝水，山云一缕随龙起。龙未离山雨到城，城中三日不得晴。明朝打鼓送龙去，愿龙十日行一雨。种田有水刈麦乾，年年谢龙神亦欢。”([7], p. 115)这首诗以“迎龙”为题，描写的就是百姓祈求龙神降雨的场景。“朝迎龙，暮迎龙，旱火烧天龙在宫”是说百姓日夜祈求盼望龙王降雨。大旱都蔓延到了天上，可是龙王却在龙宫里。“县官投牒石潭中”写祭龙仪式，县官投玉牒以呼唤龙王。在龙潭两岸，众人奏起鼓声以告知龙王旱灾发生。接着诗歌写祭祀成功将龙唤醒，龙王现身来为农民降雨。“城中三日不得晴”写祈雨结果，祭祀得到回应，城中连下了几日的大雨。“明朝打鼓送龙去”写农民要举行仪式恭恭敬敬地把龙王送走。“种田有水刈麦干，年年谢龙神亦欢”蕴含着农民对风调雨顺的期盼。农民不会忘记龙王，若是龙王能够保佑农民耕作顺利，农民也愿意年年祭祀。迎龙之后，龙王降下甘雨，但雨水过多则成涝灾，还要恭送龙王。胡奎所写《送龙曲》：“迎龙来，送龙去，翠雾红云拥龙驭。家家买纸谢龙神”([7], p. 115)与迎龙相对，这首诗写的是送龙的习俗。人们祈求龙王降雨，降雨后百姓恭送龙王离去。为了感谢龙王，家家买纸钱祭祀。大雨如期而来，这是龙王显灵。希望龙王年年底佑风调雨顺，百姓们便愿意每年祭祀感谢龙王。

元代祈雨民俗承载着原始的自然崇拜信仰，这是祈雨民俗的核心文化内核。元代农民将天地视为掌管自然的主宰，认为旱灾是上天对人类的惩罚，而降雨则是上天的恩赐，因此通过举行各种祈雨仪式，来解决旱灾。尽管元代农民的祈雨方式带有一定的迷信色彩，但从本质上看，祈雨民俗是农民面对旱灾时的一种积极抗争，是农民在面临自然灾害时，为缓解旱情、保障田地生产而做出的努力。祈雨的核心诉求是求得甘霖、保障丰收，这是元代农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这种追求也是农民生存下去的重要精神动力。此外，元代祈雨民俗还蕴含着浓厚的集体意识与社群凝聚力。祈雨是元代农村重要的集体活动，在旱灾来临时，祈雨祭祀甚至是官方举办的政治性活动。和社日一样，祈雨需要全村男女老幼共同参与，这种群体性活动不但加强了邻里之间的交流联系，也凝聚了农村社群的向心力，彰显了元代农村的集体意识与社群凝聚力，而这种集体意识与凝聚力，是农民共同应对自然灾害、克服生存困境的重要保障。

4. 结语

社日与祈雨民俗都起源于中国农耕文明古老的原始崇拜。在元代多元文化交融的背景下，社日民俗和祈雨民俗得以传承与发展，成为元代农村社会具有代表性的文化现象。元代农事诗以叙事纪实的书写和质朴自然的语言，记录了社日与祈雨民俗的仪式过程。农事诗中的民俗书写不仅展现了社日和祈雨民俗的丰富内涵，也是元代社会的真实映照。农事诗贴近农民生活，是研究元代民俗史、农业史、社会史与文化史的重要文本依据。

社日民俗根植于原始土地崇拜，核心是“春祈秋报”，是农民为了祈求土地神庇佑农业丰收而诞生的民俗活动。元代农事诗中的社日书写展示了元代社日的祭祀仪式和民间活动。元代社日中，原始土地崇拜信仰减弱，但“天人合一”的文化理念没有消失，农民的社群意识增强。祈雨民俗根植于古代自然崇拜，核心是祈求上天降雨，也是农民为了生产顺利而诞生的民俗活动。元代农事诗中的祈雨书写，基于元代旱灾频发的社会背景。农事诗所记录祈雨仪式是农民面对旱灾时的积极自救。祈雨民俗同样蕴含着原始自然崇拜和集体意识，而“杀旱魃”“鞭龙”等祈雨方式，无疑都蕴含着元代农民的抗争精神。两种民俗书写都深刻反映了元代农民对风调雨顺的期盼，蕴含着农民的美好生活愿景。

元代农事诗中的社日与祈雨民俗书写，丰富了元代诗歌的题材与艺术表现手法。并且元诗以叙事纪实为特点，其史料价值与民俗研究价值，弥补了正史记载的不足，为研究元代农村社会与民俗文化提供了独特视角。同时，民俗书写背后折射出的元代民间信仰体系、农业生产状况、多元文化交融特质与社

会经济变迁,也更加深入地反映出了元代社会的复杂性与多元性。从更广阔的视角来看,元代农事诗中所记载的社日与祈雨民俗,是元代农业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元代对民俗的传承与发展,进一步反映了中国古代农耕文明的强大生命力。其中蕴含的对土地的敬畏、对自然的尊重、对丰收的期盼、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以及浓厚的乡土情结与社群意识,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 [1] 赵东芳. 元代农事诗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大连: 辽宁师范大学, 2021.
- [2] (唐)徐坚等. 初学记[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4: 325.
- [3] 陈来. 古代宗教与伦理: 儒家思想的根源[M]. 北京: 三联书店, 1996: 100.
- [4] 杨天宇. 礼记译注[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 312.
- [5] (清)孙希旦, 撰, 沈啸寰, 王星贤, 点校. 礼记集解[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9.
- [6] 杨镰. 全元诗: 第 7 册[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3: 270.
- [7] 杨镰. 全元诗: 第 48 册[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3.
- [8] 杨镰. 全元诗: 第 14 册[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3: 126.
- [9] 邓云特. 中国救荒史[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1.
- [10] 韦正春. 论元代祈雨诗[J]. 黎明职业大学学报, 2020(1): 21-30.
- [11] 陈成. 山海经译注[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6.
- [12] 欧阳询. 艺文类聚·卷一百[M]//欧阳询. 艺文类聚: 下册. 汪绍楹, 校.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 1723.
- [13] 杨镰. 全元诗: 第 34 册[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3: 146.
- [14] 杨镰. 全元诗: 第 39 册[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3: 155.
- [15] 王溥. 唐会要·卷四十七·封诸岳渎[M]//王溥. 唐会要: 上册.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 977.